

新中国初期北京市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 的实践与启示*

——基于方法论与制度逻辑的视域

黄 东

〔摘要〕新中国初期，北京市针对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突出问题，强调“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着力从科学领导、制度安排、教学调整、课程改革、作业简化等多方面加以破解，推动教育质量明显提高。蕴含其中的方法论和制度逻辑包括：加强科学领导、系统规划；以教学为中心工作，实现意志统一、认识统一、工作统一；制定制度，梳理流程，配齐人员，解决中学校长和教研组长的忙乱问题；从上到下，层层计划，实现领导、计划和执行的有机统一。这些对当前实施“双减”政策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北京市；中学教育质量；方法论；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D232；K271；G6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798(2022)-01-0053-06

当前，党和国家实施“双减”^①政策，强调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充分体现了对素质教育的高度重视。追溯历史，1953—1956年，北京市在整顿和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对如何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尤其是中学教育质量进行讨论，审视问题，科学分析，出台文件，执行措施，取得进步。“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当年的吉光片羽，于今天仍不无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初期北京市中学教育的发展与挑战

（一）北京市中学教育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中学的创办存在公立、私立和各机构团体附设之别，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中产及以上者，学校数量有限，主要集中在内城。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市中学生人数为4万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市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方针，增加中学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并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建设，推动中学教育迅速发展。1954年，中学生人数增加至8.1万人。如果以1949年学生人数为

100%，则1950年达到115.5%，1951年为122.5%，1952年为166.4%，1953年为203.4%，1954年为202.5%。^②同时，学生的成分也在改变，工人、农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子女占中学生总数的72%。^③

中学教学质量也较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很大提高。在教学目标上，强调要“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运动，检查重理轻文及某些轻视政治课的现象，克服单纯升学作事的个人主义观点，发扬集体主义的学习精神，建立团结互助友爱的学习态度”。在

* 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新中国初期北京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1949—1956）”（项目号：16SFB500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课题“‘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叙事”（项目号：08121614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双减”，指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② 《关于北京市中学教育的问题》，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1-006-00961。

③ 翁独健：《关于中学和小学教育问题的报告》（1954年6月26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教学管理上，自1950年开始探索加强班主任专任制和级任制。北京市教育部门认为，“专任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级任制是贯彻教导合一、实施教育计划的主要环节；要适当地减少级任人员的任课时数，防止事务主义的倾向；应当加强和学生家长的联系，逐步建立起家庭与学校相统一的教育机制。^①

另外，党、团组织已在中学建立并有了相当的发展，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1951年8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能再跟中小生泛泛而谈“要爱祖国”“要为人民服务”，因为这几乎已成常识。^②

（二）北京市中学教育面临新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学教育在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面临着新的问题和需求。一方面，解决新旧时代过渡所产生的问题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培养高水平建设人才，成为时代需求。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既有提升中学教育质量、为国育才的内在需要，也有形成有效经验、推动其他地方提高教育水平的使命和担当。基于以上考量，北京市的中学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据北京市教育部门对40所中学的调查，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初三以上的学生，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业多和考试频繁。理科作业特别是数学作业比较多，文科则由原来不留作业变成普遍要求学生复习和做书面作业。各科考试虽然比较规范，也有层次，但数量过多。比如，各学校纷纷开展随堂测验、单元考试和阶段考试，有的还进行中期考试（各科都考）。二是学习时间过长。当时，多数中学生的学习时间超出国家规定。“据十二个学校的统计：高中三年级，各校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超过规定，其中有七校的多数学生每周超过六小时以上，最多的超过十九小时。高中二年级，各校多数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超过规定，其中有七校的多数学生每周超过五小时以上，最多的超过十五小时。高中一年级，只有三校多数学生的学习时间不超过规定，其余九校都超过，一般都超过三至五小时，有两校的多数学生超过六小时以上，最多的超过十小时。初中三年级，只有一校多数学生的学习

时间不超过规定，其余十一校都超过，其中九校的多数学生超过六小时以上，最多的超过二十四小时。”^③

课业过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学生睡眠时间不足。“许多学生的睡眠时间没有达到每天九小时。据市卫生局对五中、女八中等五校六个班的调查，每天能睡九小时的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小时的占百分之五十四，七小时的占百分之二十三，只五、六小时的占百分之二。许多学校的走读生一般要比住校生少睡一两小时，个别的有时甚至要开夜车。初三以上的学生，许多人要利用早晨上课前和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来作功课，有些人甚至要用中午休息时间和课间休息时间来复习。星期日学生除规定上晚自习外，白天普遍要作三、四小时功课；有的学校要作五、六小时。遇有考试还要加一两小时，基础差的学生甚至要作一天。学生说：‘星期日是大自然日’，‘我们真正空闲的时间，只有每天晚饭后半小时。’有的学生说：‘我们的生活只剩下三点一线——寝室、教室、饭厅和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学生家长的不满。”另外，课业负担重导致学生课外阅读书籍减少——由低年级到高年级不断递减。例如，在女六中，初中一年级每班每周借阅课外书31本，初中二年级每班每周11本，初中三年级每班每周10本；高中一年级每班每周11本，高中二年级每班每周9本，高中三年级每班每周4本。^④

第二，教育主管部门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贯彻不够，许多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提高教育质量认识

① 《市委教育委员会、市教育局关于市立中学改革的意见及对私立中小学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1950年），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1-023-00016。

② 彭真：《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大会上的讲话》（1951年8月7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党组关于中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情况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1-023-00021。

④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党组关于中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情况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1-023-00021。

不够全面，没有真正做到“面向教学”。当时，教育主管部门虽然提出“面向教学”的口号，但存在流于形式的倾向。主管部门没有从管理上将中学校长抓教学的要求落实下来，没有向中学校长强调领导教学是学校的中心任务，也没有给予中学校长应有的制度保证、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进行必要的检察和督促，使“面向教学”的要求打了折扣。“有些校长、教师反映教育局和各校的联系很少，有的党员校长反映他们‘成了孤儿’和‘独立王国’，除去一般的布置、号召以外，教育主管部门很少找学校领导人研究问题，也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强迫命令作风。至于说，教育局与社会和家长方面的联系就更少。”^①质言之，就是主管部门对教学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

部分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认识不全面。很多教师将教育等同于知识讲授，而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不是着重改进课堂教学，而是依靠多考试、多留作业。在教学上脱离学生的实际程度，要求过急过高。讲课时机械地依照授课计划纲要所规定的进度，不问学生是否能理解和巩固；考试次数过多，出题超过学生的程度；布置课外作业也机械地按照授课计划纲要所规定的分量，甚至有不少教师所留课外作业超过纲要规定分量的半数至一倍，严重地违反了教学上的量力性的原则。”^②教师们的急躁情绪，主要源于统一考试所产生的成绩压力。

第三，中学校长和教师的非教学活动过多，使正常教学工作受到影响。当时，其他活动过多，导致多数校长和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考虑教学问题。有些校长和教师说：“我们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③由于总体上缺乏长期计划和有效领导，大量培训和活动齐头并进，看起来形式丰富，其实杂而不精、成效不高，占用了本该用于教学的时间。

第四，招考标准宽松，生源质量良莠不齐。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私立学校很多，其中绝大多数底子很差，学生基础不好。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要求增加学生数量，客观上使中学面临一定的招生任务，这就导致一些中学为了完成招生任务而对学生考核不严，或对未达标准的学生也予以录取。“以往几年多是按任务数字录取

学生，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即使成绩很差，也可能被录取。”“有的学校学生8门功课不及格，也照样升级。”^④

第五，学校和学生围着升学转，过于看重分数，不重视劳动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提倡劳动光荣、劳动神圣，但劳动教育并没有切实有效地开展起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缺乏体育锻炼和文娱时间，自然也使劳动教育流于形式。二是不少学生受“劳心者治人”的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不愿意进行劳动，甚至鄙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⑤

此外，缺乏严格考核和工资待遇上实行平均主义等因素，也影响了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的积极性。

二、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主要措施与方法

北京作为首都，有着其他省市难以比拟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出现上述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问题，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即在新旧教育更替时期，中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而是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也存在主观上的因素，最直接的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多数学校领导对教学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有鉴于此，北京市加强科学领导，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提高教育质量作出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

(一) 强调科学领导，依托制度力量，将党和政府的意见通过文件确定下来，以保证领导力的有效发挥

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委出台《关于提高

- ① 《关于北京市中学教育的问题》，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06-00961。
- ②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党组关于中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情况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23-00021。
- ③ 翁独健：《关于中学和小学问题的报告》（1954年6月26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48页。
- ④ 翁独健：《关于中学和小学问题的报告》（1954年6月26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49页。
- ⑤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39、342页。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和各学校中的党组织、各区委、教育工会党组和有关的青年团组织，都应认真地讨论并贯彻执行”^①。6月28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学和小学教育质量问题的决议》，“责成北京市人民政府应切实领导教育行政部门迅速地坚决地把主要精力放到教学研究和教育领导上去，领导各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切实贯彻执行这些具体措施”^②。北京市委设立教育部，在学校也对应地加强党的工作，切实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为了克服具体工作中的“忙乱现象”，北京市委在工作方法和任务布置方面，要求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克服多头领导和不分轻重缓急布置工作的作风；在工作力量安排方面，要求在学生数量多的学校增加行政力量，协助校长处理行政事务，使校长能集中精力领导教学工作。

北京市委还规定要加强教研组建设，改进教学研究工作，充分发挥教师集体互助作用。^③当时，北京市中学教师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不乏教学经验很丰富的老教师，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潜力。据调查，1952—1953学年度，北京市中学教师中大学毕业及肄业的人员占比为88.8%，高于沈阳的68.7%、天津的86.8%。北京市教育界虽然提倡进行观摩教学，各校也设立各科教研组，但对于如何领导、如何发挥教学单位作用，还没有找到着力点，而同时期东北地区的教育实践则提供了范例。尽管解放初期教师总体水平并不甚高，但东北地区非常重视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加强课程教研组、教学研究会的工作，“特别是教育局长，亲自抓教学工作，组织在教学上感觉吃力的新教师，利用暑假期间集中地将下学期所教教材学习一遍，因此提高很快。有些高中学生在经过一段学习后就可以教初中的课程”^④。有鉴于此，北京市也开始强调教研组的地位和作用，以教研组为基本教学单位开展教学探索。

(二) 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引，实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的办法

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和政府开展工作的科学方法。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强调了“不要四面出击”^⑤的工作原则。具体到北京市提高中学教育质量而言，彭真明确指出，提高教

育质量的关键在领导。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各方面经验很多，但代表性经验不足，换言之，是缺乏可以借鉴并值得推广的典型经验。为此，就需要在工作上强调“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彭真指出：“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被突破，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就应该推广它。我们要善于介绍典型。对于这些典型，不必要要求其样样都好，只要有一点好就行了，我们就只介绍他这一点，大家也就只学他的这一点。”^⑥

(三) 明确提高教育质量的的原则和标准，强调统一性和规范化

彭真明确提出，对校长、教师的要求只有一条，即“把学校办好，把学生教育好”，而学生“好”，就是在坚持政治性的前提下“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⑦。北京市委强调，要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要加强劳动教育，“以克服学生中的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⑧。同时，要求在教材、教辅等方面争取实现统一，对学生的考核和检测要统一标准，要有计划地提高学生水准，对教师的考核和培养也要有计划地安排。北京市委特别强调了提高教育质量的计划性和参与性。“市教育局应制定较长期的提高

-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44页。
- ② 《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学和小学教育质量问题的决议》，《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58页。
-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43—344页。
- ④ 《关于北京市中学教育的问题》，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06-00961。
- ⑤ 《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 ⑥ 彭真：《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大会上的讲话》(1951年8月7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年)》，第452页。
- ⑦ 彭真：《提高教育质量 把学校办好》(1954年6月28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63页。
- ⑧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42页。

教育质量和发展中、小学的总的计划……各学校应订出逐步提高教育质量的学期和学年计划……担任各门主要课程的教师也应订出本门课程教育质量的计划，各班班主任也应订出本班提高教育质量的计划。最后经过校务会议讨论订出全校的计划。”并且，“从小学高年级起，各主要课程的教师制定的计划应向学生宣布”。^①

（四）抓住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领导教师系统科学地改进教学工作

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关键在于教学目标能够有效达成，这离不开对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的科学把握，离不开对成功经验的科学推广。北京市提出，要领导和组织有经验的教师集体攻关，群策群力，紧紧围绕教材和教学大纲，领会所教学科的思想指引、科学内容、教学目的，改进教学方法，形成可以推广的、能指导教学的材料，从而保证教学经验科学有效推广，减少其他教师自行摸索的时间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要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领导这一工作。同时，强调选择一批业务优秀、经验丰富的教师，在减轻其教学负担的条件下，一面教课，一面编写教案和有关的教学参考材料。经过一个教学周期，所有主要科目就都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案，以此作为新教师培训和教学的主要参考，自然“对新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及减少他们备课所用的时间都有很大帮助”。^②

（五）运用系统思维，多层并进，集中解决课业负担过重的难题

当时，中学生（尤其是初三和高三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主要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

第一，科学客观地认识分析问题。北京市既关注到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也看到教学松弛、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现象，明确指出减轻负担不是放松要求，问题要一并解决，而不是走非此即彼的极端。为此，必须坚决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认真实现毛主席关于‘三好’的指示，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运动的时间必须保证，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必须加强，课业负担必须符合学生的能力，教学工作的改进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步地进行，不得片面地加重学生的负担，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知识、品德和身体健康得到全面发展，教育质

量得到真正提高”。

第二，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一是调整教学计划。对超过教学大纲的习题加以修改，对例题也作了精简，使之适应教学进度。“在习题选配上删减过难的题目，减少‘必作题数’，使中等程度的学生能在三十至四十五分钟的自习时间内完成一节课的课外作业；适当增加选作题数，以应优秀学生的需要。在习题的分量上还要做适当的安排调整，避免发生不均匀的现象。对于其他各科的授课计划纲要，也要适当删减过难的题目，并使作业分量趋于均匀。”二是保证学生的睡眠和体育活动时间。落实保证学生每天有9小时睡眠时间和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的规定，学校对授课时间和课外作业时间的比例作出具体规定，全体师生遵照执行，责任落实到人，由班主任统一掌握和安排。三是改革考试制度，减少正式考试次数。“对各科每学期平时考试次数和每周考试的次数由教育局作出统一规定，并由各校教导处具体掌握和安排。”^③在对学生的考核方面，平时考试的次数减少了，课堂提问环节得到了加强。

三、成效与启示

在北京市委的重视下，特别是出台《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后，提高教育质量不仅有章可循，而且成为广大师生的奋斗目标。经过及时且有针对性的整顿和改进，北京市中学教育质量很快有了明显改观，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一）主要成效

1955年，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尽管教育质量的改善非一日之功，有些问题存在顽固性，但总体而言，教育方面的改变和改善是非常可观的。

第一，教师教学水平得到提高。经过政治学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第339页。

② 《关于北京市中学教育的问题》，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06-00961。

③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党组关于中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情况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23-00021。

习,教师队伍整体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北京市教育局设立专门的中、小学教学研究组织,并组织1100多名中学教师(绝大多数是初中教师)和3800多名小学教师进修业务和补习文化,提高教师们在教学知识和教学方法方面的素养。此外,还举办师范学院专修班和小学教师训练班,以保证师资水平。

第二,“忙乱”现象减少。北京市委教育部出台相关规定,规范工作任务,并相应地减少各学校党、团、工会组织布置的非教学活动,克服了中、小学存在的忙乱现象。同时,为了减轻女教师的育儿压力,北京市教育局协同工会和市妇联开办了托儿站。

第三,教学工作逐渐规范化。北京市教育局组织全市比较知名的教师组成专家组,编写中、小学的教学参考资料和授课计划纲要。尽管还存在有些科目要求偏高、布置作业过多、授课计划纲要与教学参考材料有重复之处等不足,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举措使得教学有章可循,也减轻了教师的备课负担,提高了大多数教师(特别是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信心。

第四,统一考试,严格录取标准,保证了学生的质量。从1954年秋季学期起,中学招生考试开始严格规定录取标准。1954年7月和1955年1月,北京市先后举行了中学的语文、数学统一考试。统一考试使各校教学效果有了衡量的标准,暴露出许多学校在汇报时对教学成绩“掺水”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对教学工作的改善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五,克服平均主义,对教师重新进行定级调薪,加大对优秀教师的激励力度。根据教育部的规定,1954年12月,北京市对全市中、小学的教师进行了定级调薪,极大地改变了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1955年1月,北京市奖励、表扬工作成绩比较突出的教职员5400人,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

总之,北京市各中、小学的教学工作获得大幅改进,教学气象焕然一新。“大多数学校的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上,有些校长还及时总结教学经验在学校传播。教师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备课和钻研教材普遍加强,相互学习的空气也

较前浓厚,课堂教学中的科学内容和思想内容以及教学方法上都有一些改进,多数教师纠正了忽视教学质量检查和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的偏向。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学习上比过去努力,学习纪律也有进步,许多学校出现了紧张的学习气氛。学生的学习效果一般地都有所提高。”^①

(二) 经验启示

总体而言,从方法论和制度逻辑的视域看,新中国初期北京市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经验中,值得关注且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进行科学领导、系统规划。当时,无论是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教育从业者都认为,加强科学领导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要做到科学领导,就要以教学为中心工作,实现意志统一、认识统一、工作统一;制定制度,梳理流程,配齐人员,解决中小学校长和教研组长的忙乱问题;从上到下,层层计划,实现领导、计划和执行的有机统一。

第二,强调“突破一点、取得经验”。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各学校的积极性、主动性,结合办学实际,创造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并在全市推广。如此,通过一校一个问题的解决,形成经验并加以推广,从而由点到面,汇聚成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合力。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群众路线。在发现中学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后,北京市召开了各种层面的座谈会,教育主管部门也多次开展调研。通过深入的讨论和调研,明确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最为关键的是,全市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组织保障。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088)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半年来执行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决定的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5年3月8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197页。